

# 总书记回信到侏寨，老支书喜说“山乡传奇”

本报记者吉哲鹏、严勇

站在阳台上望着对面绿海般的原始森林，72岁的侏寨老人岩翁想起从北京来的信函传到阿瓦山那个激动人心的上午。

去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他们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

几个月来，当地干部群众备受鼓舞。作为写信的老支书之一，岩翁见证、亲历了阿瓦山的巨变。他是一名佤族汉子，数十年来跟命运搏斗，与贫困抗争；他更是一名党员，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带领群众从刀耕火种走上如今的康庄大道，谱写着平凡而又伟大的山乡传奇。

## “共产党，西代勒！”

走进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的“电商+农特产品”集散中心，岩翁满脸喜悦，这个拿起来看看，那个端起来瞧瞧。货架上摆放着的笋干、蜂蜜、茶叶等农特产品，都来自阿瓦山的田间地头，是当地产业发展由单一到多样化的缩影。

“原先我们这里水田少，只能种些旱谷，一年有好几个月吃不饱饭，对产业发展完全没什么概念，能把肚子填饱就行。”回忆过去，这位佤族老人的声音有些沉重。

地处西南边陲的沧源县是全国最大的佤族聚居县，有着山青、水绿、竹翠、景美的生态名片。但由于山高水阻、交通闭塞等原因，沧源佤族人民曾长期处于深度贫困中。

岩翁回忆，20世纪60年代，佤族群众的生产方式还很落后。每年12月份，村民们就会上山砍树，伐倒一大片后再翻晒土地，春节后再划出一道防火线烧荒，连续几日都是火光冲天，到了三四月份，各家各户在分好的荒地上撒谷子，等谷子长出来，再撒些草木灰当肥料。

刀耕火种式的生活一直在延续。“粮食产量相当低，亩产就50多公斤。吃不饱的时候，我们就上山挖些野菜和山药。”岩翁说，20世纪80年代，他担任村支书后干的第一



▲岩翁(右一)手持习近平总书记回信欢呼(2021年8月20日摄)。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件事就是修水沟、挖水田。

通过改造田地，粮食单产有了明显提高。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村民种庄稼的积极性增强了。岩翁想，吃饭的问题解决了，还得带动村民增收。在政府扶持下，班洪村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橡胶和茶叶等产业。

“现在，我们村的高优茶叶就有800多亩，只要管理得好，不愁卖不上好价钱。”岩翁说，近年来，在政策扶持下，班洪村依托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旖旎风光，瞄准乡村旅游的发展契机，将生态优势转换成经济优势，持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班洪村的变迁不仅仅体现在产业发展上。1979年，班洪村有了通往乡上的第一条毛路；1998年，全部村民用上了电；2003年，实施退耕还林项目；2019年，全村脱贫出列……对于村里发生的大事件，岩翁记得比谁都清楚。说起这些，他眼里泛光。

“共产党，西代勒！”在佤语里，“西代勒”是“很好、极好”的意思。岩翁说，要是没有党

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他们不可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我常跟晚辈们讲，要牢记共产党的恩情，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党的十八大以来，沧源加快脱贫攻坚步伐，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住房安全、饮水安全、看病住院、子女上学等都有了保障。到2019年底，该县67个贫困村、4万多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 “有多少光，就发多少热”

2016年，岩翁卸任村支书，退居二线。为支持新一届村两委工作，他担任班洪村监督委员会主任，直到2021年才正式退下来。至此，他为班洪村的发展奋斗了将近40年。直到今天，村里有用得着的地方，岩翁依旧没有半点犹豫。“有多少光，就发多少热。”这是他多年的干事风格。

1950年，岩翁出生在当地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排行老大。1965年，他如愿考上沧源县民

族中学。入学那天，岩翁半夜提着马灯从村子出发，沿着蜿蜒崎岖的小路，翻过重重大山，花了好几个小时才走到从未去过的县城。

“县城像是一个很大的坝子，视野突然变得开阔了许多，很兴奋。”那时的岩翁，很多东西都是头一次见，既陌生又新奇。他省吃俭用，刻苦学习，想着以后能回到村里当老师，教会更多人读书写字。“我们这个地方教育落后，很多文化只能通过口口相传，没有文字记载。”岩翁说。

但由于种种原因，岩翁初中毕业后没有机会继续深造。他回到村子里，先后当过民兵、大队文书等。

这些经历让岩翁得到多方面锻炼。1980年，30岁的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班洪村修通了历史上第一条公路，到县城的时间缩短为一个小时。通路那天，群众从各个村寨赶来，乐呵呵地分列两侧，站在后排的村民踮着脚尖，只为看一眼小汽车。此后，轰隆隆的声音从街上传向田间地头，山路上开始出现的手扶拖拉机，逐步成为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工具。

20世纪80年代初，村民刀耕火种的山林被划定为自然保护区。1984年，岩翁当选村支书。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他领着村民们搞生产，将旱地改造成水田。粮食产量提高和茶叶种植，让村民们不用再通过伐木、捕猎谋生活，大家便一心想着把这片土地守护好。

“事实证明，保护生态这条路走通了，也走活了。”岩翁感叹道，基于良好的生态环境，班洪村才有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如今，走进俗称“观象第一村”的班洪村下班坝组，农户住的、种的、养的都成了风景，乡村发展有了旺盛生命力。

让大伙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背后，岩翁没少花心思。

2019年，在班洪村即将脱贫出列时，章略老寨有几户人家担心不能继续享受政策，迟迟不肯签字。最后，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请老支书出马。岩翁立马赶到章略老寨，跟他们讲村子在困难时期如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故事。还没讲完，几户村民就都签了字。

## 老支书们有了接班人

佤族群众素有爱国守边的光荣传统。小时候，岩翁的梦想是参军入伍保卫祖国。很多次，

他梦到自己穿着军装，跟战友们守护在边境线上。

多年前，岩翁借到一套军装，试穿后，越看越喜欢，便一口气跑到照相馆拍了“军装照”。如今，这张照片依然保存在他家的相册里。

2013年，受岩翁影响，他的大孙子参军入伍，岩翁兴奋得睡不着觉，“我们家终于出了一个当兵的人了！”

多年来，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岩翁始终冲锋向前。1998年，在全村最偏远的章略老寨，为了打通一条路，他硬是领着群众一点一点地挖，当年就挖通了8公里；2001年，在下班坝组，他发动党员和群众，拉来沙子和石头修通硬化路……

班洪村村民张光军有一手好厨艺，在岩翁鼓励下，2016年自主创业开了一家餐馆。餐馆在马路边上，一到节假日就顾客盈门。“贷了几万元的款，不到两年就回本了。”

岩翁是沧源边境村老支书们干事创业的缩影，他的老伙计们也都没闲着。

班老下班老村老支书赛金长期坚守在边境疫情防控一线。“天气炎热，蚊虫叮咬都不算什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要把边境的一草一木都守好，把爱党爱国爱家的‘接力棒’一代一代传下去！”他说。

老支书三木嘎所在的班老乡帕浪村，居住着汉族、佤族、傣族等多个民族。退下来后，他仍然秉承“各族群众是一家，世世代代不丢份”的族训，带领村民搞好民族团结，还协助村两委抓好党员培训和群众教育管理工作。

“群雁高飞头雁领，船载千斤靠舵人。”这些老支书和长期扎根边疆的党员干部，是带领群众守边固边、脱贫致富和推进乡村振兴的“主心骨、领头雁”。

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老支书们有了继续扛起重任的接班人。

2016年，38岁的赛茸接过岩翁的“接力棒”。他在上级党委政府支持下，在下班坝组建设栈道、观景台等设施，打造庭院微景观，开办全乡第一个蜂蜜加工厂，2019年还成立乡村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2021年5月，296户入股农户拿到了合作社发的30余万元现金分红。

“我们永远要跟党走，继续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赛茸说。

本报记者韩朝阳、郝源

70岁的吴贵海中学毕业，当过兵，做过生意，逛过大城市，是远近闻名的“老顶牛”。近几年，因为整村搬迁的事，一根筋的吴贵海“牛脾气”又上来了。

但一次次“顶牛”后，“老顶牛”竟给搬迁工作队员点起赞，咋回事？

## 开端

吴贵海的家乡河南省封丘县李庄镇俄湾村地处黄河滩区。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在黄淮海平原上完成了由北向南、幅度达25万平方公里的扇形摆动，上百万群众被卷入滩区，在洪水和风沙中挣扎了百年，吴贵海一家也在其中。

站在俄湾村隔黄河南望，便是饱经风沙、盐碱、内涝“老三害”的兰考县。虽然隔着一道大堤，封丘县黄河滩区也曾同样遍布风沙岗、盐碱地、水窝子。脱贫攻坚开始时，李庄镇仍是国家级贫困县封丘县中最穷的一个乡镇。

为了让滩区群众搬出“水窝子”，过上好日子，河南结合脱贫攻坚，从2015年开始试点黄河滩区移民迁建。李庄镇22个村庄，18个是滩区村，要搬迁4.1万人。

起初，搬迁工作队入村摸底，俄湾村1600多口人，一半群众不表态，等待观望；三成群众表示反对，多为老年人；仅两成群众明确支持，多是年轻人。观望、反对的群众大多有和吴贵海相同的顾虑。

吴贵海不是不想搬，挡水的“砍头柳”、遮雨的“老黄衣”、救命的大葫芦、防涝的“高房基”……几十年来，与水患相关的苦难记忆深深印刻在脑海里，滩区的苦头，他实在是吃够了。

俄湾人也不是不想搬，几乎年年夏天，村里都有几家房倒屋塌，水旱灾害交替不断。搬出滩区，新建家园，实际上是一代又一代滩区人的梦想。

## 顶牛

2015年初，搬迁工作启动时，李庄镇党委书记陈明和从县直机关抽调的20余名青年工作队队员前后脚走马到任。他们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动员搬迁，而是“评低保，赢信任”。“不让干部评，不叫代表评，就让村民以小组为单位公开评选，打开天窗说亮话，左邻右舍眼睛雪亮，彻底断绝人情保、关系保、后门保。”陈明说，办好这一件事，比空口白牙劝群众搬迁管用得多，不少群众改变了对待搬迁

工作队的看法。

当年7月，镇里组织村民交搬迁保证金，吴贵海在老伴的催促下也交了钱，订了房，但全村380户报名，他家排在了374号。

“急啥，搬不成，保证金交了也白搭。”“老顶牛”仍旧不甘心，在村头跟老伙计淡定下棋，还不忘奚落几句赶早交钱的村民，“这帮人能成事，还得继续往下看。”

## 量房

转眼过了一年多，工作队开始丈量房屋，吴贵海陪老伴在外看病不在家，由乡亲们带着工作队量了房。事后，吴贵海回家一核对，一眼看出了毛病，一间东屋宽6.7米，却登记成了6米，他当晚就到村委会找包村的副镇长周志远讨说法。

“听他一说，我心里一咯噔，工作队丈量房屋都是5人一组，很少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周志远二话没说，揣着卷尺，拿上手电跟吴贵海回了家，当场测量，果然是丈量错误，周志远连忙道歉，重新登记造册。

时隔两天，吴贵海又来找周志远，原来一间隐藏在院落东北角的楼梯间给漏掉了，“楼梯间藏在一扇小门后边，常年不开门，这次我不怪工作队，但是得给我补充登记。”工作队再次到吴贵海家实地丈量，补充登记。

再过数月，等到全村房屋丈量结果公示时，吴贵海仔细对比公示结果，又想起一间老式阁楼没有登记，他再次找到周志远。工作队搬梯子，爬阁楼，实地查看测量后发现，这间阁楼确实符合登记规定，又一次为他补充登记。

这三次纠错补登让“老顶牛”吴贵海服了气：“我认理，爱挑剔，但工作队的工作真是没得说。”

## 搬家

搬家当天，倔了一辈子的吴贵海没敢出现在搬家现场。“这是月季，这是桃红，那是紫薇，还有太阳花……”老伴来户叶在院里徘徊了一圈又一圈，对着花花草草念叨了一遍又一遍，还拿手机给每间房屋都录了像。

吴贵海的新家在占地6000余亩、有400余栋电梯房和配套学校、商超、厂房的李庄新区。由于家里子女多，吴贵海选了一套五室两厅的大房子。每逢春节，子女归家，在客厅摆上两三桌饭菜，一家人其乐融融。

“我这脾气又臭又硬，一辈子不巴结人，不假话说，但搬迁社区是真不赖。”吴贵海说。

# 贫困户变种植大户，电影也“立了功”

## 43年光影，一位农村公益放映员用银幕连接起大山内外

本报记者欧甸丘、周宣妮、李凡

面对壁柜中“古董”级别的胶卷放映机，61岁的黎仕伦神采奕奕。“从8.75毫米，到16毫米，再到35毫米，各种胶卷放映机都用过。”

作为一名农村公益放映员，黎仕伦43年在贵州余庆县的大山里架起了光影和农民之间的桥梁，当地的老百姓都称呼他“老黎”。

## 放映苦与乐

老黎酷爱电影，说起自己小时候看电影的场景仍然津津乐道。1978年，18岁的老黎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当地政府为老黎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下乡放电影。

老黎被分到余庆县敖溪区电影放映队，和另外两名同事一起，翻山越岭，走进农村生产队，为群众放电影。

上世纪70年代，农村露天电影普及，村口看电影成为几代人的温馨回忆。看电影是享受，但放电影并不轻松。每次放映，最头痛的就是搬运放映设备。一部放映机、两部影片、音箱、银幕等，总重量超过300斤。如果碰上停电，还要带上100多斤的发电机。

他已经记不清楚，多少个下雨天的路上，他摔了多少个跟头，多少次被淋得浑身湿透。

让老黎至今记忆深刻的是在老百姓家里的“戏睡”。“晚上乡亲们歇下后，我就回房关门，把衣服裤子全脱了。拿出防虫条，在床上和衣服上划几笔，这样虱子和跳蚤才不会跳到身上，或者钻到衣服里。”老黎和队友们把这种睡法叫做“戏睡”。

时代在不断前进，老黎的放映队条件也在一点一点变好。放映队的运输工具从肩挑手扛，换成了自行车，再到后来的拖拉机。

“时代在进步，放电影越来越‘松活’，但不能忘记那段苦日子，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那么一段时间，要去经受困难和磨炼，蹚过去就会看到新的希望。”老黎这样教导自己的孩子。

## 得失寸心知

电影行业兴衰更替，放映人生随之潮起潮落。1982年，生产队露天解散，原来由生产队负责支付放映成本的露天电影时代结束。失去了

稳定的经济来源后，老黎并没有等待失业。为了养活放映队，老黎和同事把乡里开会的会场空地改成了简易的电影院，开始售票放映。

时代的变迁，让老黎看到了电影行业的变数。1986年，老黎考取了贵州省电影放映技术学校，开始在职读书，学习电影技术专业，成为当时余庆县电影院系统唯一一名中专生。

1996年，随着电视机普及，农村电影市场不断走下坡路，老黎所在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陷入经营困难。在电影公司上班，以前是“金饭碗”，那时却变成了“破饭碗”。公司账上只剩下19.79元，还欠着800元的片租债务。

恰逢此时，余庆县文广局的领导找到老黎，请他主抓电影公司业务，挽救破产危局。“为了工作和同事的生活，我只能狠下心来，摸着石头过河，挑起这个担子。”这是老黎当时的念头。

临危受命，老黎在心里不断盘算：这道坎怎么跨？唯有发展多种经营。

那时，他一边下乡为农民放电影，一边带着公司20多名职工利用县城电影院的空置房屋，建起了夜宵市场，将电影院改成集文艺演出、开会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活动场所，打开了多样的经营方式。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老黎在当年就扭转了电影院和农村电影放映队亏损的局面。担子挑起了，老黎主动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98年1月，他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接下来的几年，在老黎的带领下，余庆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又步入了发展快车道。2002年，老黎所在的放映队被评为贵州“全省农村电影放映队先进集体”称号。

高光时刻，急流勇退。由于单位内部调整，老黎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又成了一名普通的放映员。

2006年，全国启动农村公益性电影放映工作，每放一场，有80元补贴。“但补贴还不够运费和住宿费，没有人愿意承担下乡放映工作”，老黎说，“我是一名党员，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就一定要好好完成。”

老黎的爱人徐兰平提前退休，和老黎组成了“夫妻放映队”，承包了农村公益性电影的放映任务。

“下乡的时候，路面坎坷不平，非常颠簸。”徐兰平说：“他开着三轮车，设备多，我坐在车后的音箱上。往边上的悬崖瞧上一眼，深不可测。他就一个劲儿地安慰我‘别怕，别怕，就当是在按摩’。”

2010年，余庆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改制，

老黎成立了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队。从那时起，老黎的放映队每年都要放映农村公益性电影700余场，后来又增加了科教电影、爱国主义影片等，每年都要放映各类影片数千场。

一路走来，起起伏伏，曾经的青葱少年，如今两鬓飞霜。“一辈子，能干好一件事，就不容易了。”老黎43年只干一件事——放电影，他认为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生，充满了美好。

## 坚守一颗心

老黎相信，对于那些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不识字、不懂用智能手机的人来说，电影不仅仅是消遣，更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电影放映对老百姓有益，这也是他从事这项工作的价值。

过去，为了节省成本，老黎和妻子经常带着床单和洗漱工具出去放映，走到哪，住到哪，有时还睡在农民家的废弃门板上。恰恰是这种经历，让老黎更加懂得普通农民的需要。

大龙村村民周其伦，曾是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2014年初，周其伦借款搞养殖，由于不懂技术，两个月不到，资金全部打了水漂，整日在家唉声叹气。这件事情很快传到了老黎的耳中。

当年3月，老黎找到村干部商量，要为村民安排几场“脱贫致富”专题电影，播放蔬菜种植科教片。村干部非常支持他的想法。

在这几场科教片的放映中，周其伦听得津津有味，他受到启发，决定把闲置的土地用来发展蔬菜产业。两年后，周其伦成为当地蔬菜种植大户。

“科普知识对农民来说，有着巨大力量。”老黎说，因为看电影，一些村民形成了买种子保留发票的习惯，在后来买到假种子打官司时成功获赔；一些村民学会用科学测量的方式解决宅基地纠纷；还有村民改变传统牲畜养殖习惯，学会了给动物测温、配饲料……

尽管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务工，平时下乡放映时，前来观看电影的人数已大不如过去，但老黎还是要求放映队一丝不苟完成放映任务。

初春时节，记者来到老黎家，看到他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我和我的祖国》《“低头族”的危害》《美丽乡村我的家》……“如果疫情防控允许，我们放映队准备今年再放3000场。”老黎说。